

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

(修订本)

世界汉学论丛

SHIJI HANXUE LUNCONG



〔美〕朱学渊 著



世界汉学论丛

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

(修订本)

〔美〕朱学渊 著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/(美)朱学渊著,一北京:中华书局,2004
重印
(世界汉学论丛)
ISBN 7-101-03336-9

I. 中… II. 朱… III. 古代民族-民族历史-研究-中国
IV. K2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6809 号

-
- | | |
|-------|--|
| 书 名 | 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
(修 订 本) |
| 编 著 者 | (美) 朱学渊 著 |
| 责任编辑 | 柴剑虹 张进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|
| 版 次 |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2004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张 12 插页 1 字数 252 千字 |
| 印 数 | 3001—6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7-101-03336-9/K · 1440 |
| 定 价 | 26.00 元 |
-

新华书店
PDG



朱学渊博士，1942 年生于广西桂林，1965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，曾于四川、南京等地任中学教师十馀载。1978 年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，师从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。1983 年在美国蒙大拿（Montana）州立大学，以多篇论文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；1985 年前曾于美国能源部属下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，涉及固体物理诸多理论课题。1987 年起在美国经商。朱学渊博士以其自然科学学力，却有志于人文科学的探索。他从中国史料中星星寥寥的语言记载切入，为争论不休的历史、语言、人类科学的难题，洞察出了许多重要的线索。

原 族

——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》修订本序

周 策 纵

朱学渊博士把他 2002 年 5 月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》寄来,说准备出修订版,并要我写一篇序。我早先就读了他第一篇文章“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”,他说 Magyar(读“马扎尔”,即匈牙利),事实上就是中国历史上的“靺鞨”族。他从“语言、姓氏、历史故事和人类互相征伐的记载中”,勾画出了一个“民族”的始末来,旁征博引,我认为有很大的说服力。后来他又讨论了通古斯、鲜卑、匈奴、柔然、吐火罗等许多种族和语言,一共辑了九篇论文,还有“附录”和“后记”,就成了本书。

大家都知道,19 世纪下半期以来,欧洲一些汉学家由于兼识多种语言,而对中亚、远东诸族的姓氏和源流,多有研考,成绩可观。如斯坦因(Sir Aurel Stein, 1865—1943)、沙畹(Édouard Chavannes, 1865—1918)、伯希和(Paul Pelliot, 1878—1945)、马伯乐(Henri Maspero, 1883—1945)等尤为显著。中国的冯承钧(1887—1947)翻译了不少他们的著作。其实是应该全部都译成中文的。中国学者懂这些语言的太少,像陈垣、陈寅恪都已经去世

了,季羨林教授又已年老。将来只能靠年青一代。

学渊这本书远远超过前人,对北方各少数民族不但索源,并且穷流,指出亚、欧种族和语言融合的关系,发前人所未发。尤其难得的是,他本来是学物理学的,能不受传统人文学科的拘束,独开生路,真是难能可贵。读了学渊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》一书之后,不免有许多感想,这里只能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。

第一,中国人“族”的观念起源很早。至少于三千五百年前甲骨文中的“族”字,就是在“旗”字下标一枝或两枝“矢”(“箭”)。丁山解释得很对,族应该是以家族氏族为本位的军事组织。这种现象在北方诸族中,就可以看得很清楚,如《旧唐书·突厥传下》说的:

其国分为十部,每部令一人统之,号为十设。每设赐以一箭,故称为十箭焉。……其后或称一箭为一部落,大箭头为大首领。

这里的“箭”,本义为“权状”或“军令”,后来则转义为“部落”了。又像满洲“八旗制度”,将每三百人编为一“牛录”(满语 *niru*,义为大箭)。因此“八旗制度”和“十箭制度”,也都在“旗”下集“矢”,是军事性的氏族组织。“族”与“矢”的这种关系,可以说中原汉族和北方民族是习习相通的。学渊说北方诸族是从中原出走的,这或许是个合理的证据。

箭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发明之一;对这个字的研究,自然非常重要。它在匈牙利语中是 *nyil*,芬兰语中为 *nuoli*,爱沙尼亚语中为 *nool*,竟都与满语的 *niru* 如此相近;而汉语中的相关词汇“弩”、

“𠬞”等，是否与之相关？也很值得深思。中国古文字研究，重“形”和“义”之解释，固然有其特殊贡献，但忽略“语音”的构拟，已经被诟病得很久了。总有一天是要兼走这条路的，而舍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恐怕不能成功。

第二，关于唐太宗征辽东（高丽）的战争，正史的很多记载并不真实。在学渊的《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》一文中，他详细叙述了这场战争，但引用的却多是中国官史的说法。多年前，柏克莱加州大学的一位美国朋友赠我一文。他根据高丽方面的记载，说贞观十九年（645）六月安市城（今辽宁海城南）之战，因高延寿、高惠真率高丽、靺鞨兵十五万来救，直抵城东八里，依山布阵，长四十里，抵抗唐军。唐太宗亲自指挥李世勣，长孙无忌、江夏王李道宗（太宗的堂弟）等攻城，然而经过三个月还不能攻下。后来因为太宗中箭，只得在九月班师。

可惜这篇文章一时找不到了，我只能根据中国史料来重构一些真相。而中国官方记录都是一片胜利之声，实在离真实很远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说安市之战时，李道宗命傅伏爱屯兵山顶失职，高丽兵夺据土山。太宗怒斩伏爱以徇，李道宗“徒跣诣旗下请罪”。太宗说“汝罪当死”，但“特赦汝耳”。据我看，太宗中箭，大约即在此时。而靺鞨兵善射，太宗可能就是中了靺鞨之箭。

《新唐书·黑水靺鞨传》说：“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，每战，靺鞨常居前。帝破安市，执惠真，收靺鞨兵三千馀，悉坑之。”同书《高丽传》所说的“诛靺鞨三千馀人”，当是同一件事。太宗对高丽军都很宽恕，独对靺鞨人仇恨，必非无故。九月班师，《通鉴》说是“上以辽左早寒，草枯水冻，士马难久留，且粮食将尽。”其实都只是借口。

《通鉴》又说，这年十二月太宗突然患痈疽，“御步辇而行”；“至并州，太子（李治）为上吮痈，扶辇步行者数日。”还有侍中兼民部尚书和礼部尚书刘洎，本是太宗的亲信大臣，“及上不豫，洎从内出，色甚悲惧，谓同列曰：‘疾势如此，圣躬可忧。’”太宗居然用“与人窃议，窥窬万一，谋执朝政”的罪名，赐他自尽。其实他不过是透露了太宗受箭伤的消息，竟惹来了杀身之祸！

《通鉴》还说，二十年二月，“（太宗）疾未全平，欲专保养，庚午（阳历三月二十九日），诏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。于是太子间日听政于东宫，既罢，则入侍药膳，不离左右。”褚遂良谏太宗多给太子一些闲暇，说明太宗已把责任都交给太子了。二十二年五月，太子率更长史王玄策击败天竺（印度），得其方士那逻迺娑婆寐，自言寿二百岁，有不死术。太宗令他“采怪药异石”，以求“延年之药”。据我看，太宗是想要治箭疮。二十三年（649），五月己巳（阳历七月十日），太宗服丹药反应崩驾。他死后四天才发表。当时宣布他年五十二，实际只有五十岁。

中国后世史家，甚至写唐史的人都很少留心敌人方面的记载。我只注意到钱穆先生的老师吕思勉在他的《隋唐五代史》里曾怀疑官方的说辞。他说：

新唐书高丽传曰：始行，士十万，马万匹，逮还，物故裁千馀，马死什七八。船师七万，物故亦数百。（通鉴曰：战士死者几二千人，马死者什七八。）此乃讳饰之辞，岂有马死什七八，而士财（才、仅）丧百一之理？

当然，他还没有注意到高丽方面的记录，可是有此见解已很不容易

了。

第三,关于李唐家族的血缘,前人也有些研究。陈寅恪曾发表两篇论文,认为唐朝皇室基本出于汉族。日本学者金井之忠发表“李唐源流出于夷狄考”一文反驳。陈寅恪又写了“三论李唐氏族问题”来答复。陈说:李唐祖先李熙及妻张氏皆汉族,其子李天赐及妻贾氏亦皆汉族,其子李虎自系汉族,虎妻梁氏固为汉姓,但发现有一例为胡人,乃只好作为可疑了案。陈寅恪是依传统,以男性血缘为主,所以终于认定李唐为汉族。

依照我从男女平等的看法,张姓本多杂胡姓,李唐皇室早已是混血种。李虎之子李昞本身已可疑,其妻独孤氏(即匈奴屠各氏,后改刘氏)当是胡族,他们的儿子李渊(高祖)必是汉胡混种,胡血可能在一半以上。李渊的妻子窦氏(太宗之母)乃纥豆陵毅之女,更是鲜卑族胡人,所以唐太宗的胡血,至少有四分之三。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(高宗的母亲),是拔拔氏(史亦称拓拔氏,也就是拓跋氏),高宗身上汉血的成分已很少很少了。

据陈寅恪考定,高宗做太子时,即烝(上淫曰烝)于太宗的“才人”武则天,太宗死后便直接娶了她。为了避免显得他是直接娶了父亲的爱妾,便又伪造武则天先在感业寺为尼,然后才把她娶来的假故事。这虽像掩耳盗铃,但于胡血甚浓的李唐家族来说,从“父死,妻其后母”的胡俗,又有什么可惊怪的呢?皇族还可略加追索,至于一般老百姓,当然更是一篇胡涂帐。

中国历来对姓氏和血缘的研究就不用心,章太炎在“自述学术次第”中说:“姓氏之学……所包阔远,三百年中,何其衰微也!”姚薇元于抗战前师从陈寅恪,他在1963年出版《北朝胡姓考》,于“绪言”中说自己是“以蚊负山”,也不为无故。

第四,这里还必须指出,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,于贞观十年六月己卯(阳历七月二十八日)因病去世,实年仅三十五。她的英年早逝,对唐朝的命运关系重大。身为皇后的她,既好读书,又反对外戚弄权。她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太宗是“布衣交,以佐命为元功,出入卧内,帝将引以辅政,后固谓不可。”她向太宗说:“不愿私亲更据权于朝。汉之吕、霍,可以为诫。”(《新唐书·后传》)太宗不听,任无忌为尚书仆射,即宰相之职;她却勉强要哥哥辞谢了。她一死,无忌就当了权,扶持了外甥李治做太子。亲征高丽时,有人建议直取平壤,无忌却主张先攻安市,结果有太宗的中箭。

后来高宗因常患“风眩”,一切由武则天控制。她把唐朝宗室几乎杀尽,连太宗的爱女和女婿,和她自己的儿女也遭诛杀。长孙无忌遭贬谪赐自尽,褚遂良则死于贬所。武则天终于篡了天下,做了皇帝。说来,在玄武门事变中,太宗把同母兄太子建成射死;自己后来也因中箭伤而崩驾,可谓报应不爽。而他让人把胞兄建成和胞弟元吉的头割下来示众,还把他们的十个儿子都杀光。时元吉仅二十三岁,想必他的五个儿子不过几岁,小孩又有何罪?

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里说:“是时高祖尚在帝位,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,而不能一救。高祖亦危极矣!”《通鉴》则评得更痛快:“夫创业垂统之君,子孙之仪刑(模范)也,后中、明、肃、代之传继,得非有所指拟(摹拟),以为口实(借口)乎!”那几代皇帝都要靠军队平难,方能继位。太宗虽然是一个历史上的好皇帝,但他也为本朝后人树了坏规矩。上述的这些恶果,多少与长孙皇后和魏征的早死有关。魏征死于征辽的两年前。太宗在战事失败后,曾叹曰:“魏征若在,不使我有是行也!”

太宗服丹药丧命,也是皇室的坏榜样,赵翼的书中有“唐诸

帝多饵丹药”一条，说贞观二十一年高士廉卒，太宗欲去吊唁，房玄龄谏阻，“以上饵药石，不宜临丧。”长孙无忌更一再拦阻。这还不是那印度方士的药，但可见他早就在服丹药了。多年后，李藩对唐宪宗（806—820 年在位）说，太宗“服胡僧药，遂致暴疾不救。”说的才是那印度方士的药。至于好色和乱伦，更是唐朝皇帝们的家常便饭了。

最后，我想质疑学渊在《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》中的一个说法。他引用马长寿的结论说“阿伏于是柔然姓氏”。并且推论说：柔然是继匈奴、鲜卑之后，称霸漠北的突厥语族部落，公元 508 年被高车族重创；又据欧洲历史记载，一支叫 Avars 的亚洲部落于 568 年进入东欧，曾经在匈牙利地区立国，并统治巴尔干北部地区二百年之久，865 年为查理曼帝国所灭。欧洲史家认为 Avars 是柔然之一部；学渊以为 Avars 就是匈牙利姓氏 Ovars，或“阿伏于”的别字。很可能是在 9 世纪末，Avars 与 Magyar 人融合，而成为匈牙利民族的一部分。

我原来以为学渊的推测很巧妙；可是一查他在注释里所引马长寿的《乌桓与鲜卑》一书，其中所说的不是“阿伏于”，而是“阿伏干”。再查马氏所根据的《魏书·长孙肥传》附其子长孙翰传曰：

蠕蠕大檀入寇云中，世祖亲征之，遣翰率北部诸将尉眷，自参合以北，击大檀别帅阿伏干于柞山，斩首数千级，获马万馀匹。

马氏认为入寇云中是在公元 424 年。我查得柞山是在绥远界内，今属内蒙。

据陈连庆著《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》(吉林文史出版社,1993年初版,页198)说:

《魏书·官氏志》说:“阿伏于氏后改为阿氏。”“于”字系“干”字之误。《姓纂》七歌、《氏族略》均不误。《广韵》七歌误作“于”。

陈氏又说:

《魏书·高祖纪》云:“延兴二年(472)二月,蠕蠕犯塞,太上皇(献文帝拓跋弘)召诸将讨之,虜遁走。其别帅阿伏干率千馀落来降。”

为什么在四十八年之后,阿伏干又来投降北魏?我再查手头的中华书局标点本,原来陈氏又将“阿大千”错写作“阿伏干”了,他们不是一个人。

我以为“阿伏干”读音,最接近“阿富汗”(Afghan),而阿富汗人多数说的是一种属于伊朗语言(Iranian language)的普什图语(Pashtu)。当然阿富汗之名的由来还须查实,1970年版《大英百科全书》说Afghan的名称是6世纪印度天文学家Varaha-mihira首先提到,当时用的是Avagana。同时期的中国历史似亦有线索,《魏书·西域传》记载过“阎浮謁,故高附翕侯,都高附城。”古之“高附”,就是今之喀布尔(Kabul);莫非“阎浮謁”就是阿富汗?此事还望学渊作进一步探索。

我在这篇序里要强调的有几点:(一)凡对外、对内关系或战

争,都应该要比较对方的记录,平衡判断。(二)官方的宣传和记载,不可尽信。(三)偶发事故,像长孙皇后和魏征之死等,往往可有长远重大的后果,历史并非有必然定律可循。(四)美国素来以世界诸族熔炉自豪,当然可贵,但还只有三数百年发展;中国却早有三数千年的民族融合了。语言、血族、文化、文明的和平交流融会,更可能是将来的趋势。我看这也是朱学渊博士此书最重要的贡献。

——2002年10月5日写成于
美国威斯康星州陌地生市之弃园

自序

中国北方诸族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。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玉成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、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杰出的统治艺术。对东西方文明社会持续数千年的激烈撞击,使它们的活动成为世界历史中最精彩和诱人的部分;而中国则承担了记载他们的史迹的最重要的责任。本书无意重复描绘他们轰轰烈烈的业绩,而是试图解析它们的语言信息,俯视它们的源流,以及它们与东西方民族在血缘和语言上的关联。

涉及人类学和语言学领域的北方诸族的研究,是在西学东渐后才在中国正式展开的。然而,外人治中国史有条件的限制,中国人治自家史又有传统的束缚。双方虽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,但总体状况却是不尽令人满意的。尽管如此,法人伯希和,俄人巴托尔德,日人白鸟库吉等,以及中国的洪钧、屠寄、王国维、陈垣、陈寅恪、岑仲勉等人,于 19 和 20 世纪中都有专精的见解和著述。

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学术间的区别,首先在于目标的差异。几千年来,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以训练背诵和注释经典的能力,来达到做官行政的终极目标;结果往往是学贯满盈,而见地不足。然则,西方学者却能大胆假设,虽时有疏于求证的结论,而探新的优势反倒在他们的手中。就北方诸族研究而言,中国史料有必须被征引的机会,而中国学者之说却难有登堂的荣誉。面对西人的大

胆宏论,国人往往只有小心求证的本份。如果说西方学术有海洋民族勇敢的精神,中国传统学术则表现为农业民族的勤奋和执着。

中国传统学术的根本弊端,可以从贡献卓著的两位古代学者,颜师古和胡三省的名字上看出一些端倪:“师古”有杜绝创新之意;“三省”则有主观唯心之嫌。这种传统决定了中华文明有前期的灿烂和辉煌,继而必有后期的守拙和停滞。近百年来,在西方学术方法的进取优势面前,我国学者往往缺乏自信。精通西学方法者少,而迷信西学结论者多。历史、语言、人类学的研究,则在“传统的”和“别人的”双重游戏规则中,纠缠于咀嚼式的考据。那些本该由中国历史作出许多判断的重大课题,却都谦让给别人去说了。

比如,由于汉字系统非表音的特殊性征,使“语言学”和“文字学”的分野在中国长期未能界定。即便是在西方语言学的科学方法传入以后,这一问题至今仍未理顺。尤其是瑞典学者高本汉倡导的以“中古音”和“诗经韵”构拟汉语“上古音”的方法,寓合理中又夸大了汉语语音的变化。然而,这些尚待检验和开发的假设和理论竟又成枷锁,使我国学界对汉语语音的基本延续性愈具疑虑,对上古文字一语音记载,或怀疑一切,或避之犹恐不及。竟而至于,通过语言信息对上古历史的研究领域,被误导到几乎完全“失声”的状态。

关于“汉民族”和“汉语言”的形成机制,自然是中国人文科学最核心的议题。“汉—藏缅语系”理论使人们注意到汉语与藏缅语间的关系;但又使人们忽视了北方诸族语言在汉语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。北方汉语的高度统一性,使我们猜测:它是由许多不同部落语言兼容而成的,在黄河流域必定发生过大规模的迁徙和

融合活动。因此,辨明中原古代居民的成分,及其语言的先后、主客和转换关系,是动力学地认识古代中原汉语形成的先决条件。

事实上,先秦文献记载的中原人名、地名及其他语言信息,与后世北方诸族的语言有着明显的可比特征。大量的证据表明,北方诸族是从中原地区出走的。它们在北方的草原地带,因改营游牧而获得了巨大迁徙能力;而所谓“西戎”民族又是由“北狄”部落转化而成的。北狄、西戎与中原民族间的这种同源关系,正是今世通古斯、蒙古、突厥语的成分在汉语中举足轻重的历史原因。

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是:藏缅式语言更可能是南方汉语之本,而北方汉语则是在南方汉语的影响下形成的。认为只有藏缅语与汉语同源的假设是片面的;那些无视北方诸族语言的因素,而仅仅依照藏缅系语言去构拟的“上古音”理论,是不尽可靠的。如若无限延拓它的合理内涵,并且用它去限制人们的思想,我敢预言:其自身将走向“谬误”,而且终将成为贻误中国人文科学发展的又一死结。

就历史科学本身来说,繁琐考据的时代应该结束了。前人没有留下更完备的史料,也是“历史”的一部分。这个无法抱怨的现实,为我们留下的是一片施展思辨、想象和洞察力的广阔空间;而“过去”既没有必要,也没有可能去精确地重现了。历史科学的使命,应该是去解析这些现成的史料,发现新证据,调用新方法,来重构一个较合理的模型,去逼近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真实过程。

语言是人类历史的化石。而“族名”作为血缘的语音标识,可能产生于人类语言的早期发育阶段,而它们又往往转化为语言最稳定的深层沉淀:姓氏、人名和地名。因此,通过揭示族名、地名、人名、姓氏的语属信息,来达成某些历史、人类科学的基本结论,是

本书采用的有效方法之一。

基于上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,我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结论。“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”是我的研究的出发,它求证了满族的先祖“靺鞨”或“勿吉”,也就是匈牙利民族的最东方的源。而“古代中原汉语中的通古斯语、蒙古语和突厥语成分”是我的思考的返归;北方诸族出自中原,走遍世界是其结论。“东亚民族对西方世界的早期入侵”则将马背上的民族西迁的时间,至少提前到希罗多德记载的年代。而“大宛”、“大夏”或“吐火罗”即是“达斡尔”,可能是“西域族国名与东北亚族名之关联”一文许多令人惊心的结论之一。本书各篇的水准参差不齐,有些虽然注重敏锐之洞察,不少则偏向愚钝之列举,追求完美的企图无以实现。

为读者检阅的便利,《金史·金国语解》、《金史·百官志》、《魏书·官氏志》、《隋书·铁勒传》、《汉书·地理志》作为语言记载,而《新唐书·室韦、黑水靺鞨、渤海》诸传作为史料,都以附录列于正文之后。《辽史·国语解》因篇幅漫长而内容散乱,且多语焉不详,则从略。

在战乱的 1942 年,我出生于流落在广西桂林的一个清白的铁路工程师的家庭,母亲是个美丽慈淑而敏于思考的知识妇女。1965 年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,曾于四川的乡间和南京的工厂任教十馀载。1978 年,方入得开风气之先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,师从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,1980 年移学美国,三年后于蒙大拿州立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,又曾于某国立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,涉及固体物理学的诸多理论课题。1985 年弃学经商谋生。

我虽曾受自然科学精密研究之训练,却偏志于人文科学玄妙